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

项目简报

(2012年总第3期)

一、“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课题研讨综述

2012年2月22日至7月4日，“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课题组在四川大学进行了10次研讨。研讨的主题分为三部分：一、民族问题研究；二、中国多民族文学的现代创建；三、“民族-文学”及其相关理论。在首席专家徐新建的主持下，成都地区的部分课题组成员参加了研讨，他们是：阿库乌雾、梁昭、王璐、罗安平、杨骊、张颖、付海鸿、刘壮、叶荫茵以及余如波和赵靓等，其他高校的教师及新进入川大博士后流动站的杨柳、邹明、朱丽晓等也参加了相关讨论。研讨采取读书、做读书报告和集体讨论的方式交叉进行。

第一部分“民族问题研究”研讨分为五次专题，分别从“民族理论与政策”（美国、联合国）、“中国民族识别与实践”（政策、文件、民族识别工程、民族史书写）、“其他多民族国家的民族问题”（美国、前苏联、不列颠）几个角度进行，内容丰富，线索繁多。通过一个多月的阅读和研讨，课题组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从横向的当代国家/国际政治的构成框架和纵向的历史脉络中去理解中国的民族问题：1. 梳理了当代世界存在主权国家（美国、中国）和跨国家组织——联合国从法律/条约上对人权的规定；并以美国、前苏联、不列颠、中国为代表，讨论当代多民族构成大国的民族政治。2. 中国当代民族政策制定的历史脉络，一方面来自马恩列斯的民族观的影响，另一方面追溯民国时期的国族建构传统。这是中国的“民族”观念从传统帝国迈入现代国家发生转折的理论资源。3. 梳理中国建国后的“民族识别工程”及其对当代的反思。

通过第一阶段对中外国家与民族相关的制度政策、意识形态文本等的阅读了解，第二阶段“中国多民族文学的现代创建”进入了对民族文学书写的讨论，



分为“民族史/民族志书写”和“民族文学作品书写”两个专题。课题组把这两类文本均视为国家进行的民族文化生产。民族史和民族志是用社会科学的话语表述，把民族识别和民族考察的成果，转化为普遍的历史知识、社会知识，这同时也是从社会工程到文学创作之间的一个过渡性文本。张颖、叶荫茵重点解读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苗族简史》的编写过程，强调民族文学作品是用虚构性、审美性的符号，构建了多民族国家的多元想象空间。邹明、梁昭、叶荫茵、刘壮等分别解读了《心灵史》（张承志、回族）、《茫茫的草原》（玛拉沁夫，蒙古族）、《正红旗下》（老舍，满族）、《亚鲁王》（苗族）、《格萨尔王》（藏族）等作品。在宏观上，朱丽晓、杨柳、付海鸿等分别讨论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创建、少数民族的文论、少数民族文学教育的议题。这一阶段提出的主要问题是：在回顾“文学”对于社会动员的关系、“少数民族文学”范畴的创建为社会提供的特定知识基础上，反思“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论”等概念在运用于少数民族文化现象时诸种问题，一一对此，徐新建教授申明本课题研究的诉求，不是沿袭旧有的范畴继续添加少数民族文学的知识，而是力图要采取新的范畴和新的思路整合“人类学的总体观、异文化多元性的研究”。

从6月开始，课题组在前期对经验性的民族政策、民族文学的阅读基础上，拓展到对当代世界性的民族/民族主义理论的了解，讨论国际学界对民族共同体、民族历史和多元民族文学的前沿研究。在这一阶段研读了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付海鸿、叶荫茵报告）、盖尔纳的《民族和民族主义》（王璐报告）、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罗安平报告）、汪晖的《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朱丽晓报告）、葛兆光的《宅兹中国》（余如波报告）、法农的《黑皮肤 白面具》（张颖报告）、霍米·巴巴的《民族与叙事》（梁昭报告）、伯恩海默的《多元文化主义时代的比较文学》（李国太报告）。各报告人梳理了西方“民族”概念的起源与发展、“民族历史”叙事的传统与理论轨迹、后现代主义理论模式下对离散式社会空间的叙事等。

这一阶段的关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对民族、历史、文学的研究，把民族与文学叙述置于西方与东方、殖民与后殖民的时空关系中去加以讨论。徐新建



教授最后进行了阶段性的总结：“民族文学”指的是人类文学的民族属性之体现、是民族共同体的诸种展示和呈现之一、是多民族文学国家的产物、是比较文学的体现；所以“民族文学”具有居间性、相对性和交融性的特点。

课题组在长达4个月的研讨中围绕“民族”与“文学”两个关键词，从社会、历史、政策、理论、文学各角度进行了丰富的阅读与讨论。取得的成效是使团队成员在细读文本的前提下加强了对基础性、前沿性知识的掌握，将未来的研究奠定于历史和世界的宏观视野上，奠定于对学界现有研究的整体性把握和反思的基础之上；并且有效地锻炼了团队的学术研究能力。下一阶段课题组的研究将着重于展开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

（梁昭供稿）

二、课题组成员动态

● “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课题组成员北京会议简讯

2012年4月6日，“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课题组部分成员在北京召开了碰头会。与会者有课题负责人、会议召集者四川大学徐新建教授、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汤晓青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钟进文教授和北京联合大学杨柳副教授。

会议就项目的定位、具体实施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徐新建教授强调，在课题第一阶段，项目组成员需要阅读文献——包括国内外民族政策、理论和各类作品，进一步开拓眼界和思路，并建立可行的读书讨论机制。到目前为止，成都的课题组成员已开过数场读书报告会，收效良好。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其他项目组成员，也应通过网络联系等方式，适时进行交流。

汤晓青研究员认为，在文献阅读中，除了政策性文献和方法论的书籍外，课题组成员还应该大量阅读民族文学文本，对于没有文字记载的口传文学文本，应展开田野调查。

钟教授指出，田野调查一定要对调查人员进行专业培训，调查方式，包括问卷设计，都应符合学科专业要求。他还提议，可以“少数民族的文学生活”为题，选定几个有代表性的地域，进行调查研究。与会者认为该选题很有意义，并对“文学生活”的内涵、调查可行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于项目的定位和最终成果去向，与会者一致认为，应立足现实、关注现实，最终成果力求对民族政策、民族教育产生实际影响。比如，应通过课题研究，唤起教育部门对多民族文学和文化教育的关注，使多民族文学课程在大学中文系的课程体系中不再缺席或退席，争取让多民族文化教育进入大学的通识课程，甚至进入到全面教育的视线中。

徐新建教授还强调，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的年会以及《民族文学研究》杂志等平台，综合几个项目合作单位的相关力量，保证高质量地完成项目研究，多出高质量的成果；另一方面，也要将“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项目视作一个良好的平台，帮助和支持项目组成员尤其是青年学者的学术成长。

（杨柳供稿）

● 课题组成员参与主办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六届学术年会

2012年6月8日至10日，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六届学术年会在重庆永川召开，项目课题成员从筹备策划、组织会议、专题发言等方面全方位地参与了此次学术年会。

在筹备策划方面，本届年会特设优秀青年论文评选环节，旨在提携青年学术新人。徐新建、叶舒宪、彭兆荣等担任了青年论文的评审工作。在组织会议方面，项目课题组成员杨骊、刘壮、叶荫茵等人积极参与会务工作，以学术实践的方式对年会形成了新的理解。

在专题发言方面，徐新建的《传统的形成和再现——自然传统和文化传统的人类学表述》，以传统、人类



学两个关键词为基点，讨论传统的形成和再现，及其在中外表述谱系中的大小之分。叶舒宪发表《玉石神话与中华认同的形成——文化大传统视角的探索发现》，探讨中国神话文学中最早发生的一大类“玉石神话”，从八千年以来的文化大传统视野，探寻它对形成中华认同所发挥的文化基因性作用。彭兆荣发表《格物致知：一种方法论的阐释——兼以食物评说叶舒宪的“四重考据”》，以食物的人类学研究视野，讨论“格物”的本义、衍义以及中西方的差异，兼顾叶舒宪教授“四重考据”及其当代学理价值和所延伸的学术空间。梁昭发表《母语“谋杀”——威尔士诗人格温妮丝·刘易斯英语诗歌中的文化认同议题》，折射出威尔士语在当代威尔士认同中的象征意义；同时也体现了在当代具有“混杂性”特征的诗人，将认同主体的复杂情境，转化为相应的具有创造性的文学形式的尝试。王菊发表《世界：英雄死亡之阈——“藏彝走廊”诸民族英雄传奇的叙事解读》，从英雄之死的情节来探求英雄传奇的叙事特点，体现着不同于英雄神话的许多要素。刘壮发表《天下仪式——从〈五帝本纪〉看神话历史》，由此表述以及如何影响后世观念。（叶荫茵供稿）

● 课题组成员动态

（以姓名拼音为序）

阿库乌雾 6月22-7月20日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合作举办“第二届中美大学生彝英双语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有关本人诗歌作品的翻译和评论分别在美国与日本的刊物上发表；近期将应邀赴挪威奥斯陆大学出席“第五届国际彝学研讨会”。



（图片说明：阿库乌雾和凉山彝族儿童）

胡格吉乐图：发表论文《〈青史演义·回批〉中尹湛纳希对儒学的蒙古化阐释》（《民族文学研究》2012年02期）等。



梁昭：主持 2012 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四川大学青年学术人才”项目：《声音的政治——“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中的“听觉文化”研究》。

刘波：发表相关论文《“文艺的”与“学术的”：现代民间文学话语范式转换新论》，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 年第 7 期。

王菊：主持 2012 年国家社科基金民族问题研究项目：文化产业背景下的凉山彝族文化发展研究。

徐新建：发表论文《“英国”不是不列颠：多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比较研究》（《世界民族》2012 年第 1 期）、《黔东南与新苗疆》（《当代贵州》2012 年第 14 期）等；5 月底至 6 月初，考察华盛顿“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

钟进文：发表相关论文两篇：《中国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现状与发展论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2 年第 1 期）、《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的互为表现——评裕固族作家玛尔简的诗文》（《民族文学研究》2012 年第 3 期）；参与编写由全国大中专蒙古文统编教材编审委员会审定的蒙古文版《比较文学概论》教材。（编者注：因受材料和篇幅所限，此处只是部分成员的动态。其余部分将在以后各期陆续登载）

三、田野考察和交流

● 华盛顿“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考察

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和艺术，多民族国家的族群关系体现在多个方面。博物馆的收藏和展示是其中重要窗口和场域之一。为了探寻和比较作为多民族大国的美国在博物馆展示方面的相关情况，笔者于 2012 年 5 月底至 6 月初，对设在



华盛顿国家广场的“国立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和“非洲人博物馆”进行了短期的专项考察；与此前后还选择费城“黑人博物馆”和纽约“大都会美术馆”作了



对比。

“国立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的英文名称为 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简称 NMAI, 1989 年开始筹建, 2004 年落成开放, 是目前第一座专门展示美洲印第安文化的博物馆。根据本次考察并作为重大项目的中期成果之一, 笔者撰写了一份专题报告, 对 NMAI 的缘起、组织、展出结构和主要功能, 以及该馆的开放情况与各界评论作了简要述评。(徐新建供稿)

● 苗族古歌田野

2011 年 12 月 31 日——2012 年 1 月 2 日, 家住东风村的吴某因为家中有人身体健康反复, 因而经仙娘看定日子决定还雉愿。之前, 笔者经过文献梳理——从《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和《古老话》以及《中国苗族古歌》等苗族古歌文本中了解到, 在还雉愿活动中要吟诵洪水滔天、兄妹成婚等古歌, 遂在国际口头诗学“五个在场”的原则的指导下, 实地调查古歌演唱在此仪式活动中的呈现以及苗族民众对于苗族古歌的认识。

东风村位于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大兴镇附近, 距松桃县城 40 公里, 距铜仁市 20 公里, 离湖南凤凰仅 18 公里, 处于湘、黔交界处, 距镇政府不到 1 公里, 是典型的城乡结合处。

还雉愿仪式程序: 安土地、安司命、铺坛、发文、接界造桥、会兵、颇雉、穿花红、上表、射土、下马、讨茭、扮先锋、扮八郎、上熟、扮土地、扮判官、进表。

此调查历时六天, 以参与还雉愿为重点。据田野观察在还雉愿仪式中仅在讨茭一节略微涉及苗族古歌, 此外通过访谈, 笔者了解到在目前东风村已经没有人能传唱苗族古歌, 甚至连古歌相关的故事也无人能够讲述。具体而言, 婚礼上已经没有 dut qul dut lanl 的演唱, 而代之以较为汉化的婚礼; 近百年来无椎牛、接龙、祀雷活动, 因而也就没有相应的古歌演唱; 丧葬仪式由道士主持, 虽然有苗族巴代即巴代熊参与, 但整个过程约 2 小时, 没有苗族古歌的《论火把》环节, 但保留“点火把”习惯。(龙仙艳供稿)



● 与贵州民协等合作开展苗族长诗“亚鲁王”的研讨工作

《亚鲁王》是在贵州麻山地区发现的一部苗族长篇史诗，一般在苗族送灵仪式上唱诵，仅靠口头流传，没有文字记录，内容是西部苗人创世与迁徙征战的历史。其主角苗人首领亚鲁王是被苗族世代颂扬的民族英雄。《亚鲁王》于2009年成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重点项目，并被文化部列为2009年中国文化的重大发现之一，随后被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经过中国民协和贵州民协的合作，2012年2月《亚鲁王》由中华书局出版，并于2月21日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成果发布会。本项目多位成员加入了对《亚鲁王》的研讨，并应邀出席2012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专题研讨会。

《亚鲁王》受到关注的原因有几点。第一是它的当下性。亚鲁王从一个地方性的麻山上升到人民大会堂这个国家行为，动用了国家资源，体现了从“自叙事”到“他叙事”进而整合为国家叙事，《东方红》也是如此。这表明现代的政治叙述已经多元化、离散化，虽然各种民族民间作品的背景不一样，但其经历的结构性质转变是一样的，是很短暂的浓缩版的民间文学运动。而《亚鲁王》的当下性和20世纪五十年代的民族考察有区别，因为有新话语的对接，一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和全球化运动给予的一个操作流程，包括非遗的申报、政府介入、媒体跟进等，形成合力让它迅速走红。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杂糅着多方话语。

第二是命名问题。在当地的自表述里，亚鲁王传唱人的意译当作“鬼师”，而现在用苗语直译成“东郎”，因为把鬼师命名为非遗传承人在当代“去鬼神化”的世俗社会里是不能被接受的。同理在阐释《亚鲁王》时要使用英雄史诗、民间文学等词汇系统，打进现有的民族文学结构中。

第三是传播策略。为什么要借助一系列相关术语来宣传《亚鲁王》？为什么要强调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性？通过为《亚鲁王》定调，它是否会变成政府、商业、媒体、市民都能接受的文化资本？在接下来的一系列活动中，这些问题势必要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叶荫茵供稿）

~完~